

90' 九十年代世界畅销书

BEVIN ALEXANDER



统帅决胜之道

【美】贝文·亚历山大 著

新华出版社



# 统帅决胜之道

● 【美】贝文·亚历山大 著

尹宏义 荣守俊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统帅决胜之道/(美)亚历山大(Alexander, B.)著;  
尹宏义 荣守俊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ISBN 7-5011-2988-6  
I.统… II.①亚… ②尹… ③荣… III.军事家-生平  
事迹-世界 IV.K8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7823 号

1995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c)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in association wit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专有权属新华出版社

### 统帅决胜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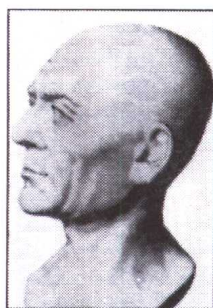
[美] 贝文·亚历山大 著  
尹宏义 荣守俊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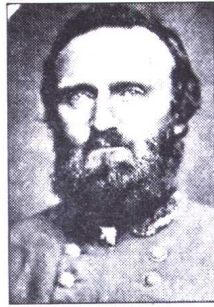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375印张 208千字  
1996年1月第一版 1996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2988-6/K·245 定价:14.00元









## 序 言

---

### 战争的规则虽然简单,但是很少得到遵守

我对高明的将帅们如何决胜的理解,是从认识到平庸的将帅们何以不胜开始的。这个了解过程始于1951年8月炎热的一天;那时我担任美国陆军第五战史小分队的指挥官,正站在韩国东部太白山的一个山谷中,目睹美军炮火轰炸我面前大约1000码(914.4米)处的983高地。

这座山峰和它北面紧靠的一座相似的山峰那时还没有获得其名字——“流血岭”和“伤心岭”。在那个夏日里,站在那里目睹炮弹消灭983高地上的所有植被痕迹的我们,已经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情。

这次攻击将是正面的——直接地沿陡峭的山坡而上,升至海拔3200英尺(975.36米)。这次进攻还将是意料之中的:炮兵部队在山南的大量集结使北朝鲜防守者们知道,驻朝美军最高指挥官詹姆斯·范弗利特少将选中了他们的防御阵地作为袭击目标。

因此,这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战争,以及紧接着发生的争夺“伤心岭”的更加可怕的战斗,从一开始就是按计划进行的,好像拿到了一个剧本,准确地照着它演出一样。



美军的炮火摧毁了山上所有的植被，但对共军士兵在其中隐藏的，被泥土、岩石和木料掩盖着的掩体，破坏却很少。然后，美国、韩国——在“伤心岭”上还有法国——的步兵沿着羊肠小道攀登险峰，因为这是唯一的路径。北朝鲜和中国的士兵们像联合国军一样熟悉这些上山的道路，他们将其自动武器和迫击炮的火力集中对准这些小径，造成一片火海，以大量杀伤登山的联合国军步兵。

一切都像计划好的一样进行——联合国军的优势火力终于使这些山峰从共军手中被夺取过来——但是，代价是惊人的。联合国军的伤亡——主要是美国人——共计为 6400 人，而共军的损失可能达到了 4 万。尽管如此，联合国军司令部一无所获。它在朝鲜的战略地位丝毫也没有提高，在战术上也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在“伤心岭”后面耸立着另一座同样布满掩体的山岭。它的背后屹立着许多其它的这种山峰，它们都可以由掩体来武装。

这两场令人伤心的流血厮杀，以及驻朝美国陆军第八集团军于 1951 年秋季下令进行的争夺制高点的所有多次战斗的唯一收获是，美军司令部终于认识到，对严阵以待的共军阵地发动正面进攻是徒劳的。对这项政策之鲁莽的认识用不着什么大彻大悟。原因很简单：再发动这样的攻击代价太高。在从 7 月间“和谈”开始到 1951 年 10 月底争夺制高点的进攻停止的这段时间里，联合国军伤亡达到 6 万人，共军的伤亡估计为 23.4 万人。

汲取这样一个明显的教训非要经过这样的大流血不可，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从有组织的战争初次发生起，对有准备的防御工事发动的正面攻击通常就是失败的；这个事实在军事史书中醒目地写着，所有将领都可以看到。更为切题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战——朝鲜战争的这一阶段对此进行了几乎丝毫不差的模仿。说它更为相干，是因为它是朝战中高级将领们的现役经历或培训内容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为正面进攻盖棺定论，表明它是不能成功的，除非付出大量伤亡的代价，以致于“胜利者”一词变

得带有嘲讽意味，因为在西部前线上两军对垒时与死神的约会中，没有任何赢家。

但是，人们并没有汲取这一教训。正是那些目睹过或者研究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堑壕战的人们，在朝鲜战争中又一次下令这样干。这种做法在朝战中的结果与在欧战中的结果是相同的：人员损失惨重，战术或战略上的效益却很小。

我从“流血岭”和“伤心岭”战斗中所领教到的一点是，高明的将帅们不像朝战中下令争夺山岭的将帅们那样行事。高明的统帅不重蹈前人的覆辙。他们不把部队投入敌人严阵以待的战斗。恰恰相反，高明的统帅们出其不意，专攻敌人力量虚弱和组织薄弱的地方。

朝鲜战争以来，军事技术上的巨大进步并没有改变这个基本的真理。技术只决定着采用什么方法实现军事决策。武器的改进实际上使统帅们更需要避开有重兵把守的危险阵地，寻求在敌人没有预料到会遭到打击的地方决战。

特别是从越南战争以来，由于采用卫星准确导航和利用雷达、红外线、激光和其它探测装置引导“灵巧”炸弹和导弹打击目标，火箭和常规（非核）武器的命中精度和杀伤力惊人地提高了。这种技术进步带来了一种预言，即未来战争将在“自动化战场”上展开，武器将会十分有效，以致人员在战场上将无法幸存，战斗将由机器人和各种无人操纵的飞机、车辆和武器来进行。

但是，有一股重要的逆反潮流，它预示着战争将较少地依赖占压倒优势的火力，而较多地依靠隐蔽的小部队的行动；这种小队通过出其不意、伏击和难以预料的调动实现其目标。

战争之所以可能正朝着这个貌似矛盾的方向转变，是因为产生了主战坦克、攻击机、战舰和火箭的技术，也造就了能够摧毁许多这种进攻性武器的武器。防御性武器比进攻性武器要廉价得多，其中有些武器一个人即可操纵。80年代苏联干预阿富汗期间，阿

富汗用来击落直升飞机的高效“毒刺”式导弹就是这类武器。“爱国者”导弹在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中摧毁了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并能够摧毁攻击机；而其造价只有一枚“飞毛腿”导弹价格的很小一部分，仅占一架战斗轰炸机的1%左右。

如果像技术专家们所认为的那样，坦克已经过时，有人驾驶的飞机和大型战舰造价太高，结构太复杂，而且太容易受到打击，因而在防御性导弹面前无法长期幸存，那么未来的战争可能很少由无人操纵的武器和机器人在“自动化战场”上打，而较多地依靠分散的、训练有素和武器精良的小部队来打；它们狡诈地悄悄绕过障碍，其战略战术较像我们今天对游击或半游击力量所联想的那样。苏联在阿富汗输掉了这样一场战争。

人类不大可能求助于核战争。任何采用核弹的做法都将立即招致核报复；这种报复可能愈演愈烈，超过人类所能控制的程度，使得地球的绝大部分地方无法居住。没有任何明智的统治者想要给自己的人民判死刑。即使一个疯狂的独裁者弄到一个核装置并使用之，理智的世界领导人几乎肯定会采取彻底解决的办法，消灭他和他的科学家们，而不会甘心遭受核毁灭。

我们这一代是看不到未来了。但是未来战争中大概将遇到统帅们从有武装冲突以来一直遇到的难题：怎样避开敌人的主力，以及如何给敌人以决定性打击。战争将发生变化，但是战争的原则将保持不变。

英格兰战略家哈特说，高明将帅的目标与3000年前的希腊传说的特洛伊战争中的帕里斯的目标是一样的。帕里斯在与希腊大斗士阿喀琉斯的战斗中避实就虚，把箭射向阿喀琉斯的唯一弱点，即他的脚跟。

南北战争中南方军中杰出的骑兵指挥官弗里斯特概括了高明统帅的奥秘，他说，获胜的诀窍是“率领最多的力量捷足先登”。

然而，对高明统帅的真正考验范围比这要广泛：是判断弱点在

哪里,在哪里才能找到阿喀琉斯的脚跟。因为成功的指挥官集中力量打击的地方一定是敌人的要害部位。要想捷足先登,军事指挥者必须明白和实践另外一位伟大的南军领导人“石壁”杰克逊的目标——使敌人“迷惑、误入歧途和猝不及防”。

因为没有任何聪明的敌方指挥官愿意暴露自己的要害部位。他只有在被迫或受骗上当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做。为实现这种强迫或迷惑,高明的统帅几乎总是以两种方式之一行事。他调兵遣将,以使敌方统帅以为他瞄准的是另外一个部位。抑或,用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方军队最伟大的统帅谢尔曼的话来说,他将使敌方指挥官“左右为难”,无力守卫两个或更多的地点或目标,因而被迫为保住一地而起码让出另外一地。

纵观全部历史,有关高明统帅的引人注目的事实之一就是,除非在拥有压倒优势的情况下,他们的成功行动都是对敌人的侧翼或后部采取的,不是实际上就是在心理上。高明的统帅认识到,攻敌后部使之分散精力、猝不及防,往往使敌人溃败,因为敌人的给养、通讯和增援被切断,从精神上讲,其信心和安全感也被大大削弱。另一方面,高明的统帅们知道,正面进攻使敌人的防御力量得到巩固,即使被击溃,也只不过迫使它退到后备力量和供应所在地。

长期以来,这些概念在许多军队中被普遍接受。用来对付一个虚弱或不胜其任的敌人,它们采用起来是得心应手的。例如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陆军上将施瓦茨科普夫采用这一经典理论,在100小时内打败了拥有50万人的伊拉克军队。他以从海上发动一次两栖入侵相威胁,并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两个师和另外一些兵力正面进攻科威特,从而使侵入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主力滞留原地;与此同时,派遣两个机动军团西进差不多200英里,进入阿拉伯沙漠。这两支部队绕到伊军后方,切断其供应线和通向巴格达的退路,将其逼入幼发拉底河、波斯湾和南来挺进的海

军陆战队之间的一个狭窄的角落中。伊军数以千计地投降，抵抗力崩溃。

并非所有战争都像 1991 年的海湾战争那样一边倒；敌人也并非都这样愿意投降。战争中最难以估计的就是人的抵抗力。由于敌人的反应无法预料，普通平庸的统帅们往往不了解侧面或后部进攻的全部重要性；此外，通常由于敌人的顽强抵抗，统帅们不由自主地采取直截了当的战略和正面进攻，而这种做法很少具有决胜意义。

高明的统帅之所以高明并且罕见，一个因素就是他能够顶住大多数部下的要求，不急急忙忙地正面交战，并且能够认识到怎样才能避实就虚地打击敌人。

这种将领所以难得，一个原因是军界像整个社会一样，赞赏直截了当的解决办法，对不直接和不熟悉的方法持怀疑态度，给它们戴上狡诈、不诚实或偷偷摸摸的帽子。二次大战中，美国人之所以憎恨日本人，一大原因是日本人对夏威夷的珍珠港这个始料未及的地点发动“偷袭”。军界和公众普遍认为，只有光明磊落地面敌对敌人的、直截了当的英雄的“好汉”美德才是理想的。这种英雄在美国西部的牛仔身上被浪漫化了；他直等到对手已经伸手掏枪时才掏出自己的六响左轮手枪。

几代军人一直把战争比喻为体育。惠灵顿伯爵说，滑铁卢之战是在伊顿公学的体育场上打赢的。在当今的美军中，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就是把战争同美式橄榄球划等号。这并非偶然。橄榄球——而不是棒球——成了战争的象征，因为橄榄球主要包括进攻者对防守者的直接挑战。同棒球相比，它肯定不是一种采用微妙伎俩、出奇制胜和施展诡计的运动项目，尽管橄榄球也能具有避实击虚的方面。直到 70 年代中期为止，美军的理论很像本世纪中叶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学进行的这种“三码和一股尘烟”的、直截了当的实力竞赛。虽然从那时以来，教学重点已经转向运动战，但是直接的

解决办法和正面攻击在军界的心理中根深蒂固，很难根除。

真诚、坦率、光明磊落的领导人一直是人们的理想。因此，成功的高明统帅必须具有两面性格，一方面向部下表现出诚实和公开性，另一方面隐藏或掩盖品格中得以使敌人“迷惑、误入歧途和猝不及防”的部分。

一些高明的统帅发现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并在执行过程中吃了许多苦。“石壁”杰克逊就因守口如瓶，不愿把计划告诉部下而臭名远扬。虽然他的士兵因他给他们带来胜利而崇拜他，但是他们认为他很古怪、不平易近人，他的主要上司们认为他难以共事、苛求、不善于沟通。他对这些指责的回答令人很受启发：“如果我能瞒过我的朋友，我就能确保瞒过敌人。”

能够表现出高明统帅所必须具备的两面矛盾人格的人寥寥无几。此外，军队中的体制也往往使直率的人比胸有城府的人较多地获得提升。因此，大多数将帅是老实厚道的、单纯的武士，率众发动硬拼的战役，下令从正面进攻。他们所造成的成为大多数战争特点的惨重伤亡和久攻不下是预料之中的。

就连一些德高望重的统帅实际上也是胸无城府的军人，并且给自己一方带来灾难。罗伯特·E·李就是一位这样的统帅——南部邦联心目中十全十美的人物。他极为正直，有正义感和忠诚；作为一名指挥官，他的能力也远远超过与他对阵的北方军将领。但是，李自己并不是一位高明的统帅。

李在正常的和十分关键的情况下总是选择直接硬拼的做法，而不是避实就虚。例如，当1862年攻占马里兰州的行动流产时，李并没有迅速撤回到弗吉尼亚州，而是任凭自己卷入发生在安蒂坦的一场正面对抗。他没有丝毫希望获胜。这场战斗成为美国历史上流血最多的一场战斗。由于南方邦联在兵力上同北方相比处于严重劣势，所以这种伤亡很大的血战只有在争取战略上的巨大好处的时才应当进行。坚守安蒂坦是徒劳无益的，而撤退到弗吉尼

亚会保住南方的进攻力量。安蒂坦之战还使林肯获得了他发表解放黑奴的宣言所需要的北方胜利，从而确保英法两国不会援助南方邦联。

1863年，李任凭自己被卷入了一场相同的消耗战。当李靠直接硬拚击溃联邦部队的努力失败后，他一错再错，使北弗吉尼亚军的最后一点进攻实力在穿越将近一英里弹坑累累的开阔地的皮克特冲锋中被摧毁。这场正面进攻在开始之前就注定要失败。朗斯特里特等将领认识到这一点，李本人在战斗灾难性的结尾时也承认了失误；而此时冲锋的1.5万名士兵当中只有一半回到南方邦联的阵地。

但是，当李在葛底斯堡与波托马克联邦军遭遇时，他的处境并不危险。他当时位于联邦军的北面；由于在这一方向上的给养比撤回弗吉尼亚要多得多，所以他本来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就冲破联邦军的阻拦，攻占哈里斯堡或约克，从而在一个方向上威胁费城，在另一方向上威胁巴尔的摩，在第三个方向上威胁华盛顿。倘若波托马克军的主力撤退回去守卫首都，李本来可以沿萨斯奎哈纳河向东南挺进，威胁费城或巴尔的摩。假如联邦军司令米德按兵不动，守卫华盛顿，李本来可以攻占巴尔的摩；那里是通往北方的所有铁路线的汇聚点，因而他本可切断华盛顿的增援和给养。如果米德出兵保卫巴尔的摩，李可以渡过萨斯奎哈纳河，夺取费城。费城当时是美国第二大城市；对北方来说，失去它会是一场灾难。

另外一位很有名气但几乎输掉南北战争的统帅是北方的尤利塞斯·S·格兰特。在1864年的弗吉尼亚战役中，格兰特一次又一次地将其军队投入对严阵以待的南方邦联军队的正面进攻中。格兰特的目的是要摧毁李的部队，但他差一点毁掉自己的军队，从春季的野战到仲夏的彼得斯堡僵局为止，他损失了自己全部实力的一半。到这次战役后期，格兰特的部队不再愿意竭力进攻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会被打败。的确，在冷港，联邦军的士兵们确信自己

必死无疑，因而在冲锋之前把自己的名字和住址贴在军装背后，以便家人在战斗结束后能够得到通知。

格兰特唯一的战略成功不是靠战斗，而是靠部队的转移获得的。他渡过詹姆斯河，逼近南方供给里士满给养的主要铁路，因为他没有再次直接硬拼，而是决定悄悄渡过詹姆斯河，使敌人猝不及防，攻占彼得斯堡。他几乎失败；弗吉尼亚的战争出现僵持局面；是谢尔曼，而不是格兰特，通过袭击南军的尾部打破了这一僵局。

类似于李和格兰特行动思路的直接行动促使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军司令毛奇破坏了谢里芬伯爵的著名计划，即派遣德军主力“迂回”到巴黎西面和南面。这个德军主力之“锤”按计划将回到北面，利用位于法德边境上的堡垒之中的德军之“砧”粉碎法军和英军。毛奇放弃横渡塞纳河的迂回包抄，而是在河北面发动正对巴黎的直接进攻。这使法军得以阻止德军的前进道路，制止德军的进攻，造成持续到1918年的堑壕战僵局，从而创造“马恩奇迹”。

1942年底，希特勒坚持主张正面进攻斯大林格勒，而不是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撤走德军，结果使一支庞大的德国军队毁于一旦，并失去了在东线的主动地位，最终将战争输给了俄国和其他盟国。

本书旨在利用具体实例表明，以往的高明统帅们如何应用由来已久的战争规则和原理而制胜，即使只不过因为他们抢在对手前面运用了它们。这些规则不是像代数公式那样的需要机械地照搬的方法，而是必须技艺高超地看情况而应用的概念。它们不是只有军事专家和军事指挥及参谋学院的高年级学生才能懂得的、深奥的抽象理论，而是两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进行殊死的战争时用来解决常见问题的对常识的运用。

每个交战者的目的都是使对手服从他的意志。试图引诱别人遵照其意愿行事，这是适用于个人、集团和国家的很平常的人类宗



旨。普通的人类争端和战争的唯一区别在于，战争是一方对另一方施加武力的暴力行动。倘若一方不动用武力即能实现其目的，它当然会这样做，因为除非存在抵抗力量，没有任何国家会发动攻击。19世纪普鲁士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下的定义是：战争是国家政策通过其他途径的继续。

看来可能很明显的一点是，卷入任何冲突的每个人、集团和国家都始终应当采用帕里斯在特洛伊战争中所采取的策略，只打击阿喀琉斯的脚跟。但是，战争和人际关系的历史结论性地表明，人类经常忽视或看不到对敌人或对手迂回包抄的机遇，而是正面打击他们所看到的最明显的目标。

人们并不经常实际或比喻性地迂回到其对手的后面去。经过100万年的文化熏陶，人类已经习惯于在一个集团中合作。这种熏陶使得我们忠诚于自己的集团，对自己集团的敌人采取好斗态度。不论是与朋友合作还是同敌人斗争，我们的趋势都是直截了当，而不是避实就虚或迂回包抄。

只有非凡的人才能把与敌人正面对抗的原始欲望，同为使敌人猝不及防和易受打击而掩盖或隐藏自己的行动的必要性相分离。但这却是成为高明统帅的唯一道路。大约在公元前400年，中国著名战略家孙子写道：“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孙子还写道，在战争中，“避实而击虚”。

许多人误解了战争中的真正目的。这一目的并不像众多军界和文职领导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在战场上摧毁敌人的武装力量。这一简称为“拿破仑主义”的观念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军事教科书和规章的编写和制订中，以及在参谋学院的教学，都曾占据主导地位。

拿破仑本人并不是这一理论的始作俑者，尽管正如哈特所指出，它来自于拿破仑在1806年的耶拿之战以后的做法，即倚仗重